

---

## 鲁迅《自题小像》诗生成考

松冈 俊裕（日本） 著  
张 铁荣 张 京津 李 丹丹 译

关键词:鲁迅 剪发 《苏报》案 排满民族革命 《自题小像》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 序 章

鲁迅所谓的《自题小像》诗<sup>1</sup>，是在写作之后的大约三十年以后的1931年又重新抄录的，他在此诗跋语中这样写道：“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之后不久，又一次在跋文中写道“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下旬在上海也。”<sup>2</sup>鲁迅两次抄写这首诗，据推测，与在那一年的1月17日，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上海英租界的英国警方逮捕，并于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枪杀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时，当鲁迅得知好友柔石被捕的消息后，为了避开事件的影响，曾在1月20日经内山完造介绍，到由日本人经营的名为“花园庄”的旅馆避难，直至2月28日。在避难期间，鲁迅通过日本的报纸得知柔石等人牺牲的消息，为对他们的遇难深表哀悼，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者的血》的悼念文章，发表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1—1《纪念战死者专号》上（4月25日）。还特别对他曾在北京大学期间所教过的学生柔石的死，表示哀悼，写下了《写于深夜里》、旧诗《惯于长夜》及《柔石小传》（均载于《前哨》1—1）。之后又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2月7日）；《写于深夜里》（1936年4月4日，根据以前的《写于深夜里》改写。）等纪念柔石的文章，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

柔石生于1901年（据《柔石小传》记载），那一年恰好是《自题小像》诗的跋文中所提到的虚岁“二十一岁”之时。该诗跋文中的“2月16日”，无论是指新历（旧历庚午年除夕），还是指旧历（新历是4月3日），即鲁迅抄写此诗时，都是得知了柔石等人牺牲消息之后<sup>3</sup>，特别是因柔石的死而触发的。鲁迅大概想到，恰巧在他自己下定决心

---

为祖国（汉民族）不惜献出生命和鲜血的那一时期柔石出生，30年后，柔石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而献身，现在自己应该做的是“忘记”柔石之死，誓为共产主义献身。因此鲁迅又重新抄写了过去曾为决心排满民族革命而创作的《自题小像》诗。只是这首鲁迅抄写的附有跋文的《自题小像》诗，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由其夫人许广平发现。

笔者数年以《自题小像》诗的写作时期这个问题为中心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鲁迅开始坚定不移地为排满兴汉的民族革命而奋斗，也就是决心以排满民族革命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时，是在1903年6至7月间所发生的“《苏报》案”之后。在此之前，鲁迅也对民族革命抱有兴趣，笔者推测他深受当时变法派梁启超，特别是其新民说的影响。（但是鲁迅对于留日变法维新派的学生们口头上提倡自由平等，而内心却追求富贵名利，抱有强烈的不满。）广泛认为鲁迅为了表达民族革命的决心，剪去了长辫子，并执笔写出了小说《斯巴达之魂》。对于剪发鲁迅自身回想主要是因为不方便而剪去，同时《斯巴达之魂》虽不能否认其民族主义的一面，但基本可以看成是在拒俄运动影响下的一部独立的爱国主义作品。（这个希腊败给波斯后复仇的故事，例如，在章炳麟（浙江人）提倡的排满革命“亡国二四二年纪念会叙”上，就曾引用这个故事做为外国的民族主义例证。）剪掉长辫发，写作《斯巴达之魂》时期，鲁迅对变法维新的期待与反清反满的情绪并存，此后经历了“《苏报》案”前后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时期之后，鲁迅才初次坚定了民族革命的立场。《自题小像》诗，正是鲁迅受到“《苏报》案”的影响，抛弃了之前的暧昧立场，明确了排满民族革命的立场而创作的。并在赠给好友许寿裳的照片背面题写的这首诗，大概就是在创作后不久抄写的吧。

细谷草子氏与笔者所得结论大致相同，《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18号所载的《鲁迅的日本留学时代的问题点》曾发表她的这一见解。但是她并未对此进行具体论证，考虑到在论证方法等方面细谷氏与笔者应该不尽相同，或者其某些观点会与笔者迥异，这里谈谈笔者的浅见，还请方家指正。

## 第一章 写作时期的上限与下限

首先，我们看一看关于写作年代这一问题海内外不同的说法。（刊行年、出版社等省略）

一、1901年说，见许广平《不容情的对敌的战斗》<sup>①</sup>；于植元《〈鲁迅诗本事〉质疑》；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集外集》注释（光绪二十七年说）；金笙《鲁迅先生〈自题小像〉写作年代小证》；芝子《鲁迅先生〈自题小像〉写作年代及其他》；纪文

---

《鲁迅著译系年目录（上）》；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光绪二十七年说）；单演义《自题小像的写作时间及其他》（光绪二十七年说）

二、1902年说，见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旧版、重订版）<sup>②</sup>；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十卷》、《鲁迅著译年表》（光绪二十八年说）；常明《〈自题小像〉的写作年代问题》<sup>③</sup>；吴奔星《鲁迅旧体诗的思想艺术特色》

三、1903年说，见锡金《鲁迅诗本事》；胡冰《也谈〈鲁迅诗本事〉——并就商于锡金、于植元》；周作人《给胡冰的回信》<sup>④</sup>、《〈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周振甫《鲁迅诗歌注》（旧版、修订版）、《试谈〈自题小像〉的问题》；细谷正子《关于医学志愿——日本留学时代的鲁迅 1》；山田敬三《鲁迅旧诗〈自题小像〉成立》等<sup>⑤</sup>；高田醇《鲁迅诗话》；文学研究社《鲁迅诗笺选集》；姜添《鲁迅诗注析》；王若海、文景迅《鲁迅〈自题小像〉作年新考》、《关于〈自题小像〉作年问题》；静闻《关于〈自题小像〉的二三问题》；韩明、陈友雄《关于鲁迅〈自题小像〉诗的创作年代》；杨天石《“荃不察”与“荐轩辕”》<sup>⑥</sup>；卫华《也谈〈自题小像〉的作年问题——与常明同志商榷》；倪墨炎《鲁迅旧诗浅说》；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鲁迅诗歌选》；王观泉《鲁迅年谱》；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鲁迅年谱·上册》；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上》；景周《鲁迅诗歌解析》；细谷草子《鲁迅的日本留学时代的问题点》；黄新渠《鲁迅诗歌》；宋谋瑒《〈自题小像〉诗注释》<sup>⑦</sup>；吴战垒《论鲁迅诗歌》；鲁歌、卫华《关于鲁迅诗〈自题小像〉的几个问题》；江天《鲁迅诗新解》

四、1906年说，许广平，见单演义《鲁迅行年考略》的批注<sup>⑧</sup>

诸位推测写作年代的根据，一是鲁迅的跋文，再一个就是引用以下许寿裳的回忆文章：

《我所认识的鲁迅》<sup>4</sup> “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在一九〇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甲）

《怀亡友鲁迅》<sup>5</sup> “他的生命是整个献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可说是实践到底、毫无愧色的。”（乙）

《怀旧》<sup>6</sup> “我还藏着录稿和他手写的诗稿有好几首，现在抄录于下。凡集外集已载的，概不阑入。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祖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之格言。”（丙）

《〈鲁迅旧体诗集〉序》<sup>7</sup> “鲁迅旧诗、多半为有索书者而作，例如……，又诗集第一首自题小像，亦赠余者。”（丁）

---

《〈鲁迅旧体诗集〉跋》<sup>8</sup>“诗抄第一首自题小像是其二十三岁时赠余者。其逝世后，拙作怀旧文中首先予以发表，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全首写留学异邦所受刺激之深、遥望故园风雨飘摇之感、以及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末句则直抒怀抱、是其毕生实践之誓言。”（戊）

《屈原和鲁迅》<sup>9</sup>“词句 荃不察 诗题 自题小像 著作年份 一九〇三”（己）

《仙台学医》<sup>10</sup>“鲁迅往仙台学医的动机有四：我在《鲁迅的生活》和《回忆鲁迅》两文中已经叙明了。别后，他寄给我一张照片，后面题着一首七绝诗，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我也在《怀旧》文中，首先把牠发表过了。”（庚）

大部分论者从许寿裳的回忆文章（甲、丙、戊、己）中推断出是1903年创作说，或者是赠呈说。但是（庚）不论是有意或无意，因与己说相驳，把此处都省略忽视了。至于著于1901年之说（在南京），以许氏的证言作为赠呈年，根据跋文中的“二十一岁时作”，以虚岁推算得出。1902年（在东京）说里面的②的重订版忽视了许的证言，把21岁视为实足年龄，认为写于生日（9月25日）以后（旧版也是1902年生日以后说。但旧版考察了许的回忆文章（丙）中的记述，认为将“1903年”作为写作年是误记。）③也与②同样是生日以后说，③认为许所说的“1903年”是赠呈年，这一点与②不同。且说1903年（在东京）说，过去把“二十一岁”视为虚岁，认为鲁迅的这个记叙有误，仅以诗的内容（排满民族革命的决心）与许所说的“一九〇三年”当时的思想状况（剪发行为等）一致作为根据。最近认为，不问“二十一岁”（1901年）或是“一九〇三年”，而把“二十一岁”视为实足年龄<sup>11</sup>（年满“二十一岁”是从1902年生日开始至1903年生日），显然1903年为写作年代，同时也是赠呈年，论证的中心前进了一步，接下来得问题是以1903年内的哪个时期为写作时期的上限和下限。最后的1906年（在东京）说，认为是由于没有自由意志基础的婚姻做为直接的契机而创作了这首诗，这不得不是说有些牵强附会的讥讽。⑧大概是许广平在附有跋文的《自题小像》诗发现之前的看法，后来她的看法转变为1901年说（①）。

笔者认为，写作时期的上限是1903年7月“《苏报》案”发生之后，下限是同年9月22日（光绪二十九年8月2日），鲁迅生日的前一天。以下是笔者在过去诸家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个人的论证。

笔者在推定写作年代时认为鲁迅在跋文中的记述是重要的线索，许寿裳的回忆文章则并非重要。其原因是许的文章始终提到的是赠呈年代，而非写作年代。当然写作年代与赠呈年代不一定一致。许在回忆文章（己）中提到《自题小像》诗的写作年代是1903年，这是从其写作年代与赠呈年同年推断而来，我们不能仅凭这一点来断定。即使做为赠呈年代，许也有两种说法。因此笔者现在暂且不参考许的回忆文章来进行论证。

首先，从鲁迅的跋文开始，必须注意的是，鲁迅是以虚岁计算在辛未年（1931年）

---

五十一岁<sup>12</sup>。因此推断在同一跋文中“二十一岁”当然也是虚岁，就有了所谓的1901年说（但是正确的应为光绪二十七年说）。然而，《自题小像》诗的诗趣与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对变法维新的期待与热衷），以及那时所写的旧诗的诗趣（内容体现的依然是旧态）完全不同，从这点来看，1901年说显然有误。那么“二十一岁”，是鲁迅计算错了吗？肯定不是。因为不止一次，第二次也清楚地记下了“二十一岁时作”。因此只能认为是鲁迅有根据有意识地使用了实足年龄。有人认为，姑且不论是否计算错误，在同一文章中有意的采用不同的年龄记法很是奇怪。而实际上对于鲁迅来说，这种情况还是有例可寻的。1930年9月25日，鲁迅为纪念儿子海婴出生一周年（前一年9月27日生），与海婴一起合影，那张照片的题字是“海婴与鲁迅 一岁与五十”。中国人不论大人小孩通常都说虚岁年龄，鲁迅的虚岁年龄“五十”对应的应是“二岁”，但是因为明确强调一周岁纪念的意义与对应语感，所以采用了实足年龄“一岁”。同样，本来应该是“二十三岁”，但因为留学时使用的实足年龄中含有着某种纪念意义，又可与“五十一岁”语感文字对应，所以采用了实足年龄“二十一岁”（或者说实足年龄二十一岁时作的事实，在他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突然回想起来，因而就记录下来）。如“二十一岁”所指是实足年龄，那写作时期应为1902年9月4日（光绪二十八年8月3日）开始至1903年9月22日（光绪二十九年8月2日）止这段期间。因而一方面把“二十一岁”视为实足年龄，一方面把那段期间限定在1902年的生日9月25日以后至1902年底的1902年说<sup>②</sup>是不正确的（鲁迅生日旧历为8月3日新历为9月4日。9月25日是从鲁迅出生的那一年光绪七年8月3日按新历换算来的。鲁迅自己每年的新历的生日，都是按旧历的生日8月3日换算成新历的，参照《鲁迅日记》）。这样，写作年代的上限与下限的框架大致也就可以推算出来了。

其次，从诗的内容来看，上限的时期还可以往后推算。这首诗的内容体现出鲁迅已经确立了排满革命的立场，写作时期当然应该是在那之后。关于鲁迅明确地确立了排满革命立场的时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支持“《苏报》案”（6、7月）以后说。此外剪发之前说，以及在《苏报》报道了（6月）关于总督、巡抚接到皇帝密令，对于革命的学生归国者即刻逮捕、处刑事件之后有了变化，这样的两种说法。前者认为，鲁迅剪发是表明其确立排满革命立场之决心的实际行动，为了纪念剪发而拍了照片，并在背面写下了相同意思的《自题小像》诗，赠给友人许寿裳。而诗的写作时期是在剪发不久，（由于许的回忆文章本身对此也不明确，评论者在赠诗方式这一点上虽有出入，但大致看法相同。这种说法至今基本已成定论。）此说是以一、剪发行为表现了排满革命的决心，二、根据许的回忆文章，“小像”是剪发纪念照片，为前提而成立的。“小像”的事暂且不提，那么剪发行为则根本表现了排满革命的决心了吗？后者认为，密令下达后，引起了海内外反清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在东京以拒俄为目的建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改组为非公开的排满组织前后，鲁迅写作了《自题小像》诗。此种说法与笔者的“《苏报》案”之后

---

说相近，可供参考。但是这种说法也存在定论批评与证据不充分等问题，论证方法也有漏洞，欠缺说服力。

在此笔者对“《苏报》案”以后说进行论证：

首先，第二章提出鲁迅剪掉辫发不过是由于不方便，不能成为推定其确立排满革命立场即诗的创作时期的参考。

其次，第三章明确《斯巴达之魂》的根本意义是在拒俄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所写的爱国主义作品，因而说写作这部作品的理由是当时鲁迅确立了排满民族革命的立场这个见解有误。

再次，第四章指明了鲁迅在满 21 岁时，由于“《苏报》案”的发生，促使其确立排满革命的立场。

最后，第五章从诗的语句内容开始分析，此诗是鲁迅在“《苏报》案”之后，彻底抛弃了由清朝政府实行变法维新的幻想与期待，确立了排满民族革命的立场，为了表明其决心而创作的。

## 第二章 剪发行为之意义

鲁迅因家境败落，于 1898 年进入官费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但他对这个学堂的授课内容感到十分失望，不久就转学到同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这是一所在开明的俞明震校长管理下的学校，鲁迅在这里不仅学习矿务，而且也接触到了梁启超等变法维新派的主张以及进化论（尤其是托马斯·赫胥黎著《天演论》）等西方的新思想。鲁迅在与这些新思想产生共鸣的同时，逐渐增强了对满族统治的反感。

1902 年 1 月鲁迅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此后他与同年级的五位同学一起被江南督练公所派遣到日本留学（南阳官费）。此时水师学堂时代的同学，他的朋友胡鼎（韵仙）写了下面的送别诗赠与鲁迅。

英雄大志总难侔，跨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

乘风破浪豪气在，上国文光异地开。旧城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时才。

（全三首，第二首省略）

鲁迅一行在俞校长的率领下东渡日本，于同年 4 月 4 日踏上了日本的国土。本来他们打算进入陆军士官预备学校成城学校学习，但由于成城学校规定入学者只限于学习陆军的学生，所以未能入校。于是便进入了由高等师范学校嘉纳治五郎刚刚创办的弘文学院普通科就学。这是一所以教授清朝留生日语和中学基础课为目的学校。学校为鲁迅等 6 人成立了江南普通班，并分配共同的宿舍和自习室各一间。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共同的寄宿生活。

---

鲁迅剪掉辫子是次年 1903 年 3 月的事情。从当时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之弟周作人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鲁迅剪发的记载。

“晚韵仙遣人送日本初五日（阴历 3 月相当于阳历 4 月 2 日——著者注）函来、云四日启行、托寄衣物、目录列后。函中述弘文散学事、监督姚某亦以私事被剪发逃去、可笑。……弘文同学照相一张 断发照相一张……”（4 月 9 日）

“晚接大哥廿一（阴历 3 月相当于阳历 4 月 18 日——著者注）函、云弘文事已了、学生均返院矣、又断发小照一张”（4 月 26 日）

上文中提到的“断发照相”“断发小照”均是鲁迅为了纪念剪发而拍的照片。之所以两次寄照片给周作人，也许是因为要把其中一张给胡鼎等人传看。“弘文同学照相”大概是指鲁迅以剪发为契机而与之加深了友谊的许寿裳的照片。所谓“弘文散学事”是指围绕弘文学院公布的新定规则 12 条（3 月 25 日）而发生的留学生罢课事件。因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的失言，导致在 3 月 29 日 52 名学生全体罢课离校。此后学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接受了学生们的条件，这样才结束了这次学潮，全体学生在 4 月 16 日返校。另外所谓“监督姚某”是指在留学生中口碑极差的江南班南洋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因姚文甫与监督钱某的妾通奸，邹容（同文书院）、张继、王孝缜等五人在 3 月 31 日夜里闯入他的寓所，在细数了他的罪状之后，用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在旧中国，犯奸的人要被剪掉发辫以示惩罚）。受到制裁的姚某在第二天就偷偷狼狈地逃回中国，而主谋邹容在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施压下逃往大阪，并于四月中旬回国，寄居在上海章炳麟处<sup>13</sup>。鲁迅剪发是发生在这两个事件之前的事情。鲁迅剪发的时间可以从以下两点来推测，首先他委托 4 月 1 日离开日本的朋友带回国的剪发纪念照的拍摄日期，当时完成一张照片平均用 10 天，以此推算，拍照时间大约是在 3 月 22 日左右；其次是在 3 月 18 日在寄给周作人的信中并没有提到剪发这件事。以此两点来推算鲁迅剪发应该是在 3 月 20 日前后<sup>14</sup>。如上所述，弘文事件发生在 25 日，据鲁迅自己的记述，我们可以知道姚文甫事件也是发生在剪发之后的<sup>15</sup>。根据以上的分析，很明显鲁迅剪发与弘文学院罢课事件和姚文甫剪发事件毫无关系，认为鲁迅是受到以上两件事情的刺激才剪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那么鲁迅剪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鲁迅自己做了下面的叙述。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sup>16</sup>

“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脑门上，令人很气闷。”<sup>17</sup>

而对于鲁迅的这种说法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是反话而不愿从文章本意来理解，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以剪发的行为必然含有排满革命之意为前提的吧。的确是有像章炳麟和吴玉章这样身怀排满革命之意而剪发的人，但是据鲁迅所讲，即使是后来创立华兴会的黄兴在弘文学院时代也未曾剪过发，相反那些剪了辫子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国之后又做

---

了清朝的忠臣（也就是说他们又开始留起了辫子）<sup>18</sup>。另外还有许寿裳，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堂（旧求是书院）也是该学堂以排满革命为目的浙学会的会员，他因不耐烦盘辫子，便在他去日本的当天就和同行的朋友一起剪掉了辫子<sup>19</sup>。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于1906年9月在去日本前夕与一个同行者在上海剪掉了辫子<sup>20</sup>。对于周作人来说剪发不过是去日本留学之前必然要履行的例行手续罢了。还有同是日本留学生的景梅九，在与第一高等学校同学笔谈中曾记载说，日本人云辫子难看剪掉为好，他们把这个叫做猪尾巴，这强烈的刺痛了景梅九的自尊心，于是剪掉了辫子<sup>21</sup>。也就是说，即使是不赞同排满革命的人，也会剪掉辫子，而赞同排满革命的人也不都是因为身怀排满之意而将辫子剪掉的。当时，提倡剪发的文章和报道均刊登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上奏要求下达剪发令，其列举理由就有一个是不方便。谭嗣同（《仁学》）认为脑袋的前面没有保护，而后面垂着长发辫气闷的很。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则列举了留辫子的种种不便也阐明了剪发的好处。他认为长垂的辫子容易卷入机器之中，在打仗时也很不便，容易弄脏衣服，因洗发不便所以不卫生，梳头也要花很长时间，在国外被外国人指点讥笑，被儿童拉扯摆弄，还被人耻笑为猪尾巴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末的《天津日日报》上刊载有关剪发易服的文章：有传闻说西太后政府将在翌年正月下达断发易服的命令，剪发易服的四大好处，一是能使新旧融合，二是能使中外友好，三是能促进满汉和睦，四是能使平民与教徒和睦相处，希望这个传闻能够成为现实（《论断发易服之大利益》）<sup>22</sup>。此后，在1903年3月18日发行的浙江同乡会会志《浙江潮》第2期上登载了署名为匪石<sup>23</sup>发表的一篇题为《野获一夕话 发厄》的文章。这篇文章从生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剪发的必要性。文章这样写道：“抑吾闻生理家言世界处发之道四，曰全去之则僧人之所行也，曰全留之则妇人之所行也，曰短之则欧美之所行也，曰前则尽去而后则尽留之则今中国人之所行也，其害为最甚，发以护脑也，于前尽去则脑伤，于后尽留之则负重而滞，必不足为法，（自政府留辫令下，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监督，令学生皆留辫，独生理学教习日人某勿善也，某见学生去辫，常赞之以为有益生理），故今人明生理学者必断断争不剃辫也。”

综上所述，正如鲁迅所说因不方便而剪掉头发是很有可能性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与鲁迅关系非常亲密的许寿裳和周作人，对于鲁迅剪发的理由是如何叙述的呢。鲁迅剪掉发辫后先来到许寿裳（浙江班）的自习室。许寿裳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鲁迅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许寿裳说：“壁垒一新！”鲁迅便用手摸了一下头顶，两人相对一笑<sup>24</sup>。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谈及剪发的理由（这就表明，鲁迅剪发的理由并非是值得特别记录下来事情，也就是说和上述许寿裳剪发的理由很相似）。周作人在首次具体谈到鲁迅剪发一事的文章<sup>25</sup>中写道：“有些速成班的学生、舍不得剃去一部分、整个的盘在头上、帽顶特别突出、样子很是难看、被加上轻蔑的诨名曰‘富士山、’有的还有几缕短发、从帽子下面漏了出来、在颊边飘动、更显得男不男女不女的。自爱的学生受不住这种刺激、便发愤剪发、剃光成为和尚头、鲁迅也是其中



之一。”文章并没有说鲁迅是因身怀排满之意而剪发的<sup>26</sup>。

纵观 1903 年春天的中国与东京清朝留学生界的动向，完全没有发现什么能够强烈地震撼鲁迅民族感情的事件，让他坚定排满民族革命的立场，致使他剪掉辫发。与此相对，如下一章所述，在当时发生了一系列唤起中国人（不分满汉）爱国热情的事情。

如果说有一件事能导致鲁迅决心剪掉辫子的话，那就是在剪发前十天左右的 3 月 10 日，鲁迅与许寿裳等 30 余人作为第一批学员进入由加纳校长提议，在弘文学院新设立的讲道场牛入分场开始学习柔道<sup>27</sup>。如果要写一个以鲁迅剪发为题材的剧本，那大概应该是这样的：感到辫子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的鲁迅，在开始学习柔道后越发深切的感受到它的不便，他在犹豫了十几天后终于决定要剪掉辫子。或者是鲁迅正在学习柔道的时候因发辫的不便发生了什么事，再或者是他读了上文提到的《发厄》这篇文章，受到了鼓舞，毅然剪掉辫子。但问题是鲁迅剪发的方法，如果是突然剪掉辫子的话，会因为头顶前半部没有头发而显得异常滑稽可笑。如果剪成短平头或者剃成光头的话又不太体面。照片 A（见文末）系拍摄于 1903 年的照片，被看做是所谓断发纪念照片<sup>28</sup>。就算始终把这张当做剪发纪念的标准照，那么从这张照片本身来说，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并不是突然剪掉辫子的，至少几个月前他就下定了剪发的决心，从那时起就开始为剪发做准备<sup>29</sup>。笔者的结论如下。鲁迅自从来到日本以后，就感到辫子很不方便，他在某个时候下定了要剪发的决心，但是注重自身形象的鲁迅并不愿意剪一个难看的发型，所以他决定等到剃掉的头发长到适当长度之后再剪掉辫子，剪掉辫子不过是因为剃掉的那部分头发长到了适当长度而已。也许是因为学习柔道以及《发厄》这篇文章（不确定鲁迅是否读过这篇文章）成为鲁迅剪发的直接契机，促使他将剪发的时间稍稍提前了一些而已。虽然鲁迅在下定剪发决心之后，也预想了事后周围人的反应而几经犹豫，但这时已经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况且在进入讲道馆后他还曾考虑是否要将断发的时间提前。鲁迅是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辫子的人。

但是周围的压力要比预想来得强烈，监督官姚文甫义愤填膺，扬言要取消官费将他遣送回国<sup>30</sup>。这是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辫子的（头发的）重要性。但鲁迅明确地认为短发含有民族革命之意是在《苏报》事件发生以后的事情，他从那时起才坚定了排满革命的立场。

### 第三章 《斯巴达之魂》与拒俄运动<sup>31</sup>

东京的排满革命派以章炳麟亡命日本（1902 年）为契机，为了真正扩大其势力，策划了一连串的活动。比如计划举办中国亡国 240 周年纪念会，成立以排满革命为目的的青年会，成立各省同乡会并发行同乡会杂志，还有 1903 年在留学生新年会上的排满演说等等。尽管如此，革命派<sup>32</sup>毕竟还是少数。

---

留学生界多数学生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一个民族要自立，与革新政府制度相比，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国民）的影响下，将如何培养国民性作为第一大课题。《新民说》以及作为其具体化策略的军国民化构想，促使梁启超站在与排满革命相近的立场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革命派。

俄国撕毁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有关撤出义和团事件时派出的军队的协定，不但没有在1903年4月实施第2次撤军，而且还提出了7项新要求作为撤军的条件。日本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有关俄军毫无撤军迹象以及新7项要求的报道，最初留学生们似无暇关注此事。因为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很多刺激包括革命派在内的留学生的爱国感情的事件，他们将目光全都聚集到这些事件上。这些事件包括围绕第五次劝业博览会（大阪，3月～）发生的一系列日本方面恶意侮辱清国事件（“人类学馆出品事件”、“台湾馆女子事件”、“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事件”），在成城学院举办的运动会上，高悬各国国旗，唯独没有清国龙旗，因此发生了抵制运动会事件，还有发生在成城学院的某上尉猥亵留学生事件，另外王之春为了镇压广西省的叛乱，以出卖本省利益为条件请求法国出兵。到4月28日各大报纸都详细刊登了有关新7项要求的内容，特别是某报纸刊登了俄国代理公使谈话，其内容是有关俄国目前的政策是将东三省划为俄国领土，这样东三省问题就引起了留学生的高度关注。留学生们认为此事不仅是俄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列强分割中国领土的重大问题。4月29日召开了留学生大会，会上做出了如下决议：成立义勇队，发电报给北洋大臣袁世凯以及上海各团体，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将义勇队编入北洋军，向天津派遣特派员等。此后义勇队在5月2日正式定名为学生军，并制定了军规（“目的：拒俄”“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由于受到日本政府干涉，于5月11日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宗旨：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临时公约 一、此公约之目的在拒俄”）。5月14日根据改组时的决议，决定派变法派的钮永建、汤尔和作为特派员去天津求见袁世凯。随着核心人物钮永建、汤尔和二人的出发，这次运动的实权最终落到革命派手中，他们试图间接地将排满革命的想法灌输其中，但其意图被人密告清政府，5月27日湖广总督端方沿江海各省下达了调查逮捕令，同时皇帝也下达了相同的密诏。6月5日，《苏报》详细报道了政府的镇压行动，同一天上海的《同文沪报》报道了两名特派员在天津遭政府杀害。东京的会员得知两名特派员被杀的消息后，情绪激昂，开始讨论革命的方法<sup>33</sup>。但这完全是误报，6月12日，《苏报》刊登了两人未能达成目的由天津返回上海的报道。

此次拒俄运动的情况也刊登在《浙江潮》上，第四期（5月16日发行）刊登了《拒俄事件》，第五期（6月15日发行）刊登了《记军国民教育会》。鲁迅除了看《浙江潮》的报道之外也能从义勇队、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他的朋友许寿裳那里了解到运动的详情<sup>34</sup>。《浙江潮》第五期刊登了历史翻案小说《斯巴达之魂》（只刊登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刊登在第九期〈11月8日发行〉上）。许寿裳在刚刚接任《浙江潮》编辑的时

---

候就向鲁迅约稿，而鲁迅第二天拿来的就是这篇小说<sup>35</sup>。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许寿裳是从第五期开始接编的，杂志大都是按照刊期顺序发行，因此可以推测约稿、写稿、交稿的时间是在5月中旬。也就是说《斯巴达之魂》这篇小说写于东京的拒俄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小说的梗概是这样的：公元前480年，里奥尼达斯王率领300名斯巴达战士，在温泉关迎战波斯侵略军，300名斯巴达战士全部牺牲。但是士兵克力泰士因眼病住院而未能参加战斗所以只有他一人幸存，他的妻子埃烈娜<sup>36</sup>为此而感到耻辱，便以死相谏，克力泰士后来在浦累皆战役中战死，洗刷了自己的污名，斯巴达军也获得了雪耻的胜利。鲁迅大概是在看了给袁世凯的信（上述《拒俄事件》中引用）中有关介绍斯巴达军在温泉关英勇作战事迹的内容，从中得到启发而写这篇小说的<sup>37</sup>。附带一说，在《斯巴达之魂》的序言中出现的“泽尔士”（薛西斯〈xerxes〉的英语读法）“……死战，全军歼焉”，等都是在给袁世凯的信中使用过的句子<sup>38</sup>。不过实际写作时依据的应该是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日译本）<sup>39</sup>以及日文版的历史教科书、参考书之类的书籍。小说中，国王的亲戚、两位少年拒绝了国王让他们回国的劝告，留下来共同战斗直到最后英勇牺牲的情节，烈妇埃烈娜死谏懦夫克力泰士的情节，还有一队童子军登场高唱军歌等情节，均为鲁迅原创，这些都是鲁迅对当时发生的事件的反映。这些事件包括，福建和浙江的两位少年不顾周围人们的劝阻，毅然要加入义勇队（参考《拒俄事件》），留日女学生志愿者们希望担任看护工作而加入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同时策划成立红十字社（参考《拒俄事件》以及刊登在《浙江潮》第五期上的《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社之缘起》一文），还有留学生们成立义勇队、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等<sup>40</sup>。还有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回忆说《斯巴达之魂》是描写斯巴达尚武精神的小说。这大概与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不无关系（着重号为引用者加注）。本来军事国家斯巴达及其尚武精神，也就是梁启超在军国民化构想中作为中国应该学习并反复介绍和赞扬的东西（参考了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及《新民说》等文章）。

综上所述，可以说《斯巴达之魂》这篇小说是受到梁启超的军国民化构想的影响，以及直接受到拒俄运动的波及而写成的爱国主义作品。

#### 第四章 “《苏报》案”和鲁迅

上海的革命派，最初与东京方面采取共同行动，但是在5月末他们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对东京方面的爱国主义立场、拒俄目标以及求助于政界的做法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东京方面为了回应这些批判，待特派员回日之后，在7月5日召开了欢迎会，会上提出把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改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的改革意见书。意见书得到了过半数的支持，但也有10余名会员退会。11日该会决定解散。12日晚留学生会馆

---

接到上海的“《苏报》案”发生的电报，之后不断出现退会者，军国民教育会最终解散了。通过这次风波，军国民教育会过渡为秘密结社性质的以排满革命为目标的后期军国民教育会。此后，以鼓吹、暗杀、起义三种手段向中国国内推进革命运动。

“《苏报》案”发生的经过如下。邹容回国后，写出了倡导排满与共和制的《革命军》，章炳麟为其作序。6月以后致力于革命宣传的《苏报》在6月9日刊登了《读革命军》、《介绍邹容革命军》，10日刊登了章炳麟的《序革命军》，以此来介绍《革命军》这本书，并于6月29日摘登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此清政府在6月30日，请租界警察出面共同镇压袭击苏报馆，逮捕了章炳麟等人。而担任此次逮捕查办指挥一职的正是变法维新派的大员江苏候补道原陆师学校校长俞明震<sup>41</sup>。7月1日，听闻章炳麟被捕的邹容向租界警察投案，《苏报》也在7月7日被查封。章、邹2人与同时被捕的另外4人一起从15日开始在租界法院受审，到1904年4月结案，章炳麟被判监禁2年，邹容被判监禁3年。章炳麟于1906年刑满出狱，而邹容则在1905年4月死于狱中。在审判开始后的7月19日，湖南的沈尽因被怀疑企图推翻清朝政府被逮捕，并于31日遭到杀害（《浙江潮》第七期刊登了有关残杀的报道）。8月23日在愚园为沈尽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诵读了章炳麟在狱中所写的《祭沈尽文》（刊登于《浙江潮》第九期）。章炳麟又在狱中作旧诗两首《狱中赠邹容》（五律尤韵、7月22日）、《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五古“第二句真韵，第四、六句元韵，第八句文韵，真韵通押”，8月4日），表达了未能与邹、沈两位同生共死的心情（刊登于《浙江潮》第七期）<sup>42</sup>。这次镇压事件（文字狱）反而起到了向世人宣传《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作用，通过事件爆发的消息的传播以及《革命军》等宣传文章的流传，使排满革命浪潮在各地迅速高涨起来。此前，由于各省同乡会杂志加强了革命宣传以及《苏报》向革命派转化，在普通学生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对梁启超等的立宪君主论的不满情绪，他们赞同排满革命的倾向遂逐渐增强，而“《苏报》案”成为推动此倾向增强的催化剂。

事件的爆发给东京留学生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加之一部分革命派推动军国民教育会向非公开组织改组，留学生中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变法派都要表明各自的政治立场<sup>43</sup>。再来看浙江籍留学生的活动，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在召开特派员欢迎会的当天，举行以特派员汤尔和欢迎会兼回国人员的欢送会为主题的夏季同乡会。“《苏报》案”消息传来，得知同乡章炳麟被捕，留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在牛入区赤城元町清风亭召开紧急会议。正巧来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的徐锡麟声援了这次集会，在这里他认识了陶成章、龚宝铨，因话语投机，散会后他拜访了陶成章的寓所，由陶成章介绍认识了义勇队的队长钮永建，他与钮永建畅论天下增强了信心，坚定了推翻清政府的决心。据推测参加此次聚会的除了陶成章、龚宝铨、徐锡麟之外，还有蒋方震、蒋尊簋、许寿裳、沈颀民、王嘉榘、董鸿祯、魏兰、陈魏、蒋智由等，以浙学会、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为中心，支持民族革命的浙江籍学生人士。蒋智由是当时著名的变法维新派人士，同时他也主张革命

---

（《浙江潮》总编辑）。浙江的革命派分成几个部分，浙学会派和在日革命派的中枢军国民教育会派，还有一部分人间属两派担任两派之间的联络员与调停员，其周围也有蒋智由等人不属于任何组织。

我们来看看光复会成立前他们的活动。同年阴历秋，陶成章回到浙江会见会党的首领未果，返回东京（回国时蒋智由写了送别诗《送甸耳山人归国》<sup>44</sup>（刊登于《浙江潮》第九期）。同年阴历10月，或许是接受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方针，浙学会的十几名在日会员，聚集在其成员王嘉榘的寓所另组秘密革命团体，决定利用日俄战争的机会，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之中的一省作为根据地，然后逐渐扩大战果的计划。决定由陶成章、蒋智由、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魏兰和龚宝铨<sup>45</sup>，以及周树人（鲁迅）等浙江“革命志士”分别担任组织干部。许寿裳以及沈颀民邀请鲁迅加入时，鲁迅欣然允诺<sup>46</sup>。同年阴历11月初，在王寓召开第二次集会（鲁迅等全体出席），会上决定派遣陶成章与魏兰分往浙江、安徽，龚宝铨往上海，并由沈颀民派遣张雄夫（当时在上海）往湖南长沙与华兴会黄兴联系。虽然对于其余成员的任务并不很清楚，但是他们大概都在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来为革命做贡献。同年冬，陶成章与魏兰回国后奔赴杭州寄居在白话报馆（兼营《浙江潮》的代卖业务）。该报的主笔孙翼中（浙学会会员）因病于阴历夏5月从日本回国，陶成章等人经孙翼中介绍与浙江的会党首领取得了联系，此后他们在各地进行排满宣传工作。陶成章后来来到上海，与在当地组织暗杀团的龚宝铨一起成立了光复会（1904年阴历10月），陶成章为了与东京的原发起人商谈，与魏兰一起赴日（阴历12月），在此成立了光复会东京分会。王嘉榘为负责人，蒋尊簋、董鸿祎、许寿裳、鲁迅等入会。

据推测鲁迅应该是出席了上文提到的紧急会议，并在那之后的暑假回到中国<sup>47</sup>。9月7日，他正好与从南京回家的周作人一起离乡、翌日到达杭州，在杭州旅行社白话报馆见到了汪希（上文提及）等人。回国时虽然在上海买了假发发辫，但是回国期间似乎还是因发辫的事情吃了不少苦头。16日从上海出发，20日左右抵达东京，23日鲁迅迎来了自己22周岁生日。可以认为“《苏报》案”使鲁迅受到很大的冲击，以此为契机鲁迅加深了与革命人士的交流，而且得到了阅读《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机会，最后决心将自己一生投入到排满革命事业中，他在《自题小像》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并将它写在照片背后送给挚友许寿裳。既然要赠送表达排满革命决心的诗，那么此前他们二人肯定将排满革命问题当作共同关心的事情讨论过。能够让人回想起的是，鲁迅与许寿裳二人在这一年的春天关系变得亲密以后，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认为中华民族最缺乏的是“诚”与“爱”，换句话说就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sup>48</sup>，其病根就在于汉族曾经两次被异族奴役，所以得出必须要进行排满民族革命的结论。（参照许寿裳《回忆鲁迅》等。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排满革命成功，国民性改造也即完成，应理解为积极培养中国人具备“诚”与“爱”的国民性与排满革命的实现相关。如不如此理解，就会逻辑颠倒。）我认为二人得出这个结论是在“《苏报》案”

发生前的事情。倡导排满革命的浙学会成员许寿裳的立场本来就十分明确，他当然会将自己的立场明确的传达给鲁迅（当然这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坦诚地说出他是会员的实情）。鲁迅虽然在理论上承认排满革命的必要性，但因对变法维新抱有期待、对革命本身充满不安，所以他并不像许寿裳那样明确地站在支持革命的立场上，正因“《苏报》案”的发生使得鲁迅下决心明确地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所以他在诗中表达了这种决心，并将其写在照片的背面赠给了许寿裳<sup>49</sup>。

问题是那张照片是什么样的照片以及赠送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一般的说法是根据许寿裳的回忆：“在1903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甲），将“小像”解释为剪发纪念照片，“后”解释为以后，认为鲁迅赠诗是在剪发后不久<sup>50</sup>。但是许寿裳从没说过“小像”是断发纪念照片。只不过是我們自己硬要这样理解罢了。还有关于“后”的理解，许寿裳的另一段回忆写道“鲁迅往仙台学医……。别后，他寄给我一张照片，后面题着一首七绝诗，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庚），对照这段回忆来看，我认为应该理解为背后的意思<sup>51</sup>。如果从许寿裳将手中留存的一张背后题诗的照片作为唯一回忆当时情况的线索来考虑的话<sup>52</sup>，他是否有可能没有写出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照片背后题有诗句），而写了后来补送诗句等不确定的事情呢。没有用“后面”一词而是用“后”大概是因为文言文的表现形式。正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小像”所指的可能就是剪发纪念照，但是也可以认为不是，比如其他的近照。无论如何这一定是一张值得赠给许寿裳的照片。倘非如此的话，只在纸上题诗赠与许寿裳就行了。关于赠送的时间，因为许寿裳的回忆（庚）与其他证据相比更具真实性，所以也可以看作是鲁迅去仙台之后赠给许寿裳的。是否可以认为鲁迅离开了东京，虽去地方学医，但他将毕生献给排满革命的意志并没有改变，为了将他这种心情传达给在东京的许寿裳（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学科在学），鲁迅把一年前作的诗写在比如说在仙台拍摄的照片背面送给许寿裳。当时有可能看到这首诗的人中有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认为他自己有可能看到这首诗，如果看到了的话，看到的时间最晚（没有写在日记里）也应该是在暑假之前（④）。这是与写作时间相关的问题，但是周作人的这个证言，是建立在鲁迅只要作诗都会给他看或者寄给他这个假设下才成立的，不足以作为参照。只给周作人看而不给许寿裳看，从当时情况看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如果鲁迅作诗时既没有让周作人又没有让许寿裳看的话，那就很容易明白了。但问题是，鲁迅在作此诗时到底有没有可能不让挚友许寿裳看呢。关于这一点有必要深入思考，希望今后能有所考证。

## 第五章 《自题小像》诗解

起句，“灵台无计逃神矢”。灵台，《庄子·庚桑楚》：“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郭象注：“灵台者，心也。”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中有“热力无量，

---

涌吾灵台，吾起！”之句（诗人台陀开纳加入了抵抗拿破仑侵略军的普鲁士义勇军，这是他写给父母的书信中的句子），鲁迅在《破恶声论》（1908年）中有：“（今天志士们——笔者）岂其屡蒙兵火，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之与！”之句，都是指内心（上述两篇文章中出现的“灵府”与“灵台”意思相同，均指内心）。此诗中也应该解释为内心。认为“灵台”=“轩辕之台”（《山海经》）=中国（⑤等）的解释是不合理的。无计，是一种强调的写法。神矢，关于神矢有很多说法，比如许寿裳的爱神之箭的说法，爱恨兼指的说法，以拜伦的长诗《海盗》为典故的飞矢说，永远不会射偏的奇妙之箭的说法。在这里依据许寿裳的爱神之箭的说法，将神矢解释为爱神之箭，像丘比特的箭一样，无论你是否愿意只要被爱神之箭射中就会产生爱情（鲁迅曾创作歌颂爱神丘比特的白话诗《爱神》（1918年））。根据以上分析，起句的意思应该是：我（鲁迅）来到日本以后，因为周围发生的种种事件刺激着我的内心，这些事件包括围绕万国博览会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及拒法事件，特别是拒俄事件，使我热爱她（祖国）、担忧她（祖国）的心情变得越发强烈。

承句，“风雨如磐暗故园”。风雨如磐，《诗经·郑风·风雨》序：“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五代蜀国贯休的《侠客行》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出门何处出”。《广韵》：“磐，大石也”。龚自珍的《哭洞庭叶青原》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黑云雁背如磐堕”。鲁迅《月界旅行》（1903年）、《破恶声论》中有：“黑云如磐”，1910年给许寿裳的信中写道：“故乡已雨雪，近稍就温，而风雨如磐，未肯霁也”。暗，应该解释为被黑暗笼罩。故园，原意为故乡，在这里应该解释为故国中国。根据以上分析，承句上接起句，其意思应该解释为：且回头遥望祖国，国民长期以来受到异民族专制统治之压迫丧失了活力，缺乏抵御外敌的力量。

转句，“寄意寒星荃不察”。寄意寒星，《楚辞·九章·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远游》：“奇传说之托辰星兮”，宋玉《九辩》：“愿寄言于流星兮”。寒星是太乙（北辰的神仙名字）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一年中在北方夜空熠熠生辉的北极星。附带一说，鲁迅翻译的《地底旅行》（1906年，启新书局）中有主人公们看到“寒星”的情节（时间是6月）。荃不察，《楚辞·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荃蕙化为茅”，“怨灵修之浩汤兮，终不察于民心”。荃本是香草的一种，引申为君主、君子之意。草字头的字有时也用来指代当时的革命志士（参照沈颀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见《上海文学》1961年10月号）），但这里应该解释为君主，也就是指德宗光绪皇帝（与结句中的“轩辕”相对应）。根据以上分析，转句的意思应该解释为：鲁迅一方面被排满革命的思想所吸引，另一方面又寄托于夜空中熠熠生辉的北极星，（不管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能同时看到）希望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满清政府（当时实权握在西太后手中，她从1902年开始实施缓和的改革政策）能够挽救中国免于灭亡，坚决实行变法维新，

---

安抚国民，富强国家，共御外敌，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回应鲁迅的希望，反而镇压逮捕那些真正为国家着想的人士。

结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汉族传说中的始祖黄帝，他被当做是排满革命的象征（黄帝也是中国医学的始祖）。结句的意思是，如果继续任由满族统治的话，中国必将灭亡，所以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将中国从满族手中夺回来，我要将我的生命（一生）全都献给民族光复运动。

山田敬三先生认为这首诗是一首诙谐风格的打油诗（⑤），但即使是从对待柔石之死的方式上来推测，我也认为他的说法不正确。正如许寿裳所说（丙、戊）这是鲁迅“毕生实践之誓言”。《自题小像》一诗用旧体诗的形式表现出鲁迅心中涌起的真实感情（民族革命的决心），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来看，这首诗对青年时代的鲁迅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

## 终 章

是否坚定的支持排满革命与是否加入革命组织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正如细谷先生所说不认为鲁迅曾经加入过类似军国民教育会之类的组织。现实中也存在不加入任何组织的“革命志士”（蒋智由在被邀请加入光复会准备会之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他们以各自的能力和方式来为革命做着贡献，他们都具备关键时刻拿起武器战斗的觉悟，从这点来看，“革命志士”无论是否加入组织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光复会成立后也是这样）。

鲁迅从明确支持排满革命的立场到出席光复会准备会之前这段时间的活动，就我的浅见来看是只限于写作活动。这段时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利用文章或者文学作品来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科学意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其目的是为了破遗产之迷信，改良思想，振兴产业，补助文明（《月界旅行》中的《弁言》、《中国地质略论》），同时他希望通过宣传科学，向读者们传达一种精神，那就是不追求功名利禄、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在鲁迅看来，他们是托马斯赫胥黎的进化论——《天演论》的实行者。）的探索精神、冒险精神、尚武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还有创造型研究者的核心才能——想象力（介绍居里夫人发现镭的《说钼》<sup>53</sup>和科学冒险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即是如此）。也就是说与翻译雨果的作品《哀尘》、执笔小说《斯巴达之魂》同样，鲁迅介绍科学也含有以此来改造国民性——就是许寿裳所说的中国人欠缺“爱”（对他人的赞同）与“诚”（去除虚伪）的目的。要全面掌握当时鲁迅所描绘的救国道路，因受到资料上的制约是比较困难的，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推翻异民族的专制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邹容《革命军》），充实国力，从灭亡的边缘挽救中国。



---

可惜的是浙江的革命派认为革命时机已经到来，一方面策划创立革命团体，一方面却停办了一直以来起着革命宣传作用的杂志《浙江潮》。鲁迅因此失去了发表作品的重要场所，加之他升学的问题，于是便逐渐远离了写作。

鲁迅于1904年4月从弘文学院毕业，9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是该校第一个中国学生。对他来说医学作为科学的一部分，能起到打破迷信，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同时也是改善体质，减少病痛死亡，培养刚强意志的有力手段，并且在战争时还能以军医身份从军。鲁迅选择学习医学，并非意味着他减少了对中国人精神改造的关心。对他来说医学和柔道（其目的之一是“存诚去伪”）一样，是与精神改造相关联的学问。当时包括医学在内的卫生学就是建立在“健全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体中”这个想法之上的，为了让军国民精神得到发扬，卫生学（医学）的必要性被再三强调，其被视为爱国人士必修的科目之一<sup>54</sup>。鲁迅选择学医，是因为与未来的职业密切相关，医学是最为合适的现实选择，也是为了实现排满革命而作的积极选择。就这样，鲁迅将培养（改造国民性）肩负救国事业的理想人物（“豪侠之士”〈《中国地质略论》〉）的追求，实践于医学方面——即以医学塑造强健的身体（医学造人）。为了可以专心学习，他选择了仙台医专，这里没有中国人，不会有其他留学生来打扰他<sup>55</sup>。在专心学医的鲁迅头脑中，一定深深铭刻着发现了镭的居里夫人等不求功名利禄、致力于研究的科学家们的形象。

但鲁迅刚刚入学，日本当时那种轻伦理重知识的填鸭式医学教育方式使他产生疑问，在没有自由思考机会的学习余暇，他比别人更加努力地思考伦理方面的问题。标志着鲁迅所追求的医学（科学）造“人”到达顶点的是，他对《造人术》<sup>56</sup>这部短篇小说的翻译，这部小说描写了化学教授“伊尼他”苦心钻研成功制造出了“人芽”的故事。通过这篇小说的翻译，鲁迅反而可能了解到通过医学手段来造“人”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是可怕的，并且深悟探索不通过医学而直接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可以认为那时他已经开始关注文学对培养精神意志的独特作用，通过阅读给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带来巨大影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sup>57</sup>，鲁迅了解到文学具有巨大的力量，它能够改造国民精神，改造社会，改变国家。同时鲁迅也注意到要创造出拥有巨大力量的文学作品，想象力（构思能力）会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通过所谓幻灯事件，鲁迅深切地认识到改造国民精神比强健身体更有必要，这是个直接的契机，为借助文学力量来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鲁迅之弃医从文就成了必然的结果<sup>58</sup>。

## 跋 语

本文是笔者近期修订的《鲁迅——〈自题小像〉诗成立考》（日文，最早发表于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纪要《人文科学论集》第16期，1982年）的中文译本。先由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铁荣先生、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日语讲师张京津女士、信州大学非常勤讲师李丹丹女士翻译，后经笔者最终定稿而成。因而，翻译上的完全责任在于笔者。



A



B

## 注

<sup>1</sup> 本来鲁迅（本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会稽人）东京留学期间，将这首诗赠与挚友——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浙江山阴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赴日，就读于弘文学院普通科（浙江班））时，此诗并没有题目。鲁迅死后许寿裳首次披露这首诗时为此诗添加了《自题小像》这个题目。据此，复社版《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1938年）正式采用了“自题小像”，此后，这个题目就成为这首诗的通称。

<sup>2</sup> 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诗稿》（1976年，文物出版社）。据此纪文《鲁迅著译系年目录（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业刊·第1辑》（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录）中在1901年《自题小像》诗一项中有“墨迹二幅、现存”的记载含义明确。

<sup>3</sup> 笔者认为“辛未二月十六日”为公历2月16日。正确的记载应该是“庚午2月16日”。使用干支纪年却用公历来记载月份日期，初看似乎有矛盾，但鲁迅使用这样的方法记录日期还有其他例证。（如《悼杨铨》一文为“酉年六月二十日作”（同跋文），但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可以确认这个时间是公历1933年6月20日）。从2月16日的日记所述“夜收水沫书店版税七十三元六角。付南江店友赎款五十”来推断，鲁迅得知柔石等的死讯应该是在当天的深夜。而且，如果将2月16日当做是公历时间的话，此时鲁迅虚岁不过五十岁而已，大概是虚报一岁吧。不管怎样如果不用虚岁来计算，1931年鲁迅不会是五十一岁。

<sup>4</sup> 1936年10月27日。见许寿裳著《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sup>5</sup> 1936年11月8日。见《我所认识的鲁迅》。

<sup>6</sup> 1936年12月19日。见《我所认识的鲁迅》。

<sup>7</sup> 1944年5月4日。见《我所认识的鲁迅》。

<sup>8</sup> 同上。

<sup>9</sup> 《亡友鲁迅印象记》二。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年，峨眉出版社）。

<sup>10</sup> 《亡友鲁迅印象记》五。见《亡友鲁迅印象记》。

<sup>11</sup> 《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执照》（“学生周树人、现年十九岁（正确来说应该是二十岁——笔者注），身中，面白无须……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中《同瀛录》（“周树人、豫才、二十、浙江绍兴、二十八年三月、南阳官费、弘文学院普通科”）、《浙江潮》第三期所载《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周树人、豫才、二十一”）、《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1903年出版、“周树人、二十一”）、仙台医专的“入学申请”（1904年6月1日、“……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同三十七年四月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入学速成普通科毕业、清国留学生、二十二年”），从上述记录来看，鲁迅留学时使用的是周岁。

<sup>12</sup> 参照注释3。从鲁迅的日记（1930年9月24日“今日为阴历八月初三日、予五十岁生日”、1933年9月22日“是日旧历八月三日、为我五十三岁生日”）和生日纪念照片上的记载（“鲁迅1930年9月24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也能明确得知当时鲁迅使用的是虚岁。

<sup>13</sup> 关于姚文甫事件，刊登在1903年4月10日的《苏报》上的文章《东京留学界汇述》以及《邹容传》（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章中有详细记载。

<sup>14</sup> 细野浩二《分界线上的鲁迅——追寻鲁迅日本留学的足迹》（见《亚洲评论》66（1976年12月，朝日新闻社））（据说细野浩二认为当时洗照片的时间平均为10天是受到了木村毅先生的指点。）又根据东京工业大学讲师古川成俊先生以及日本摄影界的泰斗菅先生所说，1903年的时候，从拍摄到将照片交给客人，一般需要两周到20天左右，根据天气情况也有10天左右可以完成的情况。

<sup>15</sup> 小说《头发的故事》（1920年10月）。

<sup>16</sup> 同上。

<sup>17</sup>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936年10月17日）中有如下记载。“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sup>18</sup>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sup>19</sup> 许寿裳《剪辫》（见《亡友鲁迅印象记》1，收于前面提到的《亡友鲁迅印象记》）。

<sup>20</sup>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65《往日本去》。

<sup>21</sup> 景梅九《罪案》（1924年，国风日报社）。《浙江潮》第七期（10月11日出版发行）所刊载的文章《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孙冀中）中关于留学生的剪发理由做了如下记载：“其有剃辫者大率不能忍日人之唾骂，日人称中国人辫子为猪尾或称豚尾又称半边和尚盖一半剃发似和尚也，或于体操时因辫之障碍而受蹉跌损伤破额流血之苦不胜愤怒而遂放手一刀斩断葛根以为快然”。留学生中剪辫子的人之所以比国内的学生多是因为在国外更能感受到辫子所带来的不便，另一个原因是国外剪辫子不受拘束。

<sup>22</sup> 转载于《新民业报》第24号（1903年1月13日）。该报第25号（同年2月11日）也刊登了题为《易服色问题》的文章。

<sup>23</sup> 汪希（素民）、钱塘人、成城学校。他曾在《浙江潮》第10期（1903年12月8日发行）上发表文章《野获一夕话 剃发》。

<sup>24</sup> 同注释19。

<sup>25</sup>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部《呐喊衍义》20《剪发》。

<sup>26</sup> 但此后周作人又认为鲁迅剪发的理由是为民族革命。（④、《鲁迅的青年时代》11《东京与仙台》）。周作人一方面反对将鲁迅神化，另一方面又为制造鲁迅的英雄传说出力。周作人这里说鲁迅剃成和尚头，但当时的日记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许的回忆文章也没有提到。如果将照片A或B（见文末）看作剪发纪念照，那么周作人的这段多年后的回忆显然有误。

<sup>27</sup> 根据《讲道馆花名册》中的《牛入分场》（“自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入门者花名册（这是根据同馆所藏的《讲道馆牛入分场修行者誓文》编写的）以及细野先生的论文。其中明确记载了入门日期，33人中许寿裳等24人是明治三十六年3月10日，两人是同年4月。其余包括周树人（鲁迅）等5名江南普通班学生在内的7人的入门年月日一栏虽是空白的，但把这个日期看作是许寿裳等同在明治三十六年3月10日入门的应该没错。附带说明，周树人的本籍一栏的末尾之所以有“户主”一项，是因为理应是户主的祖父周介孚因科举舞弊事件而入狱（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已经去世）。

<sup>28</sup> 例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1976年，文物出版社）一书写道：“鲁迅毅然剪掉发辫，拍摄了这张照片，并赠许寿裳”（“照片说明”）。把这张照片当成是剪发纪念照，但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难以让人信服。周作人和许寿裳得到剪发纪念照的原件与这张照片的关系尚不明确。有待考证。

<sup>29</sup> 照片B是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时赠给同学大家武夫的，照片背面写着：“癸卯春日写于日本之东京即明治三十六年也”（在中国也发现了相同的照片，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一书将这张照片当作是弘文学院的毕业照<1904年4月拍摄>，这显然有误），特意赠送弘文学院时期的照片，由此可见，这张照片很可能是为了纪念某事而拍摄的，从拍摄日期（1903年春）推算，这张照片可能也是剪发纪念照中的一张。剪发纪念照并不一定只有一种。这张照片有可能是鲁迅寄给周作人的两张剪发照中的一张。且不论此照是否剪发纪念照，如果把它当做是剪发后不久之拍摄的话，那么从这张照片中我们也能看出鲁迅并非突然剪发的。

<sup>30</sup> 同注释15。但据周作人所说，这件事大概并不是真的（注释25《剪发》）。

<sup>31</sup> 文章中有关该运动的说明，大部分参考了中村哲夫所著的《拒俄义勇队·国民军教育会》（见《东洋学报》第54卷<1971年>所载）。

<sup>32</sup> 通过同乡会活动与浙学会成员等浙江籍革命人士交往（特别是浙学会成员许寿裳与沈颀民（光绪二十九年3月前往日本，就读于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与鲁迅同一宿舍）的影响重大）以及阅读《浙江潮》上所刊登的宣传革命文章，这些对提高鲁迅革命意识起到不小的作用。

<sup>33</sup> 冯自由《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见《革命逸史》初集）。在吴玉章的《辛亥革命》中也记述了有关汤与钮回国后，因袁世凯拒绝会面，导致日本留学生更加愤慨的事情。

<sup>34</sup> 革命派并未全部加入该组织。其成员吴玉章有这样的回忆，并非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性才加入的，

而是因为大家都参加了所以自己也加入了（《辛亥革命》）。通过《学生军名单》以及《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名单》可以确认鲁迅并不是该组织成员。

<sup>35</sup> 《亡友鲁迅印象记》4《〈浙江潮〉撰文》。见许寿裳所著《亡友鲁迅印象记》。

<sup>36</sup> 与之相对应的外文应该是 Selene ( $\Sigma \epsilon \lambda \eta \nu \eta$ ) = 月神（女神）和 Siren ( $\Sigma \epsilon \iota \rho \eta \nu$ ) = 冥界女神（她的任务是将死者送入冥府）。

<sup>37</sup> 关于给袁世凯的信与《斯巴达之魂》的关联性，野泽俊敬在其《“药”的世界 第三部寻找“药”之根——年轻的鲁迅与革命党》（见《热风》第2号〈1971年，读鲁迅会〉）一文中早已指出过。

<sup>38</sup> 杨天石《〈斯巴达之魂〉和中国近代拒俄运动》（见1976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sup>39</sup> 据说当时已经出版了羽花生翻译的《史记》，但未能找到。不过，据岩波文库的《历史》一书的译者松平千秋所说，二十年前有关学会进行的调查表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坂本健一翻译的《希罗多德 历史》（1914年，隆文馆）。

<sup>40</sup> 《浙江潮》第1、7、9各期都刊登了喋血生的小说《少年军》。

<sup>41</sup> 当得知担任镇压指挥者是变法维新派人士、自己的原校长俞明震时，鲁迅肯定受到了打击。可以认为此事推动了鲁迅脱离变法维新派。附带一说，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时代的朋友，同属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的陈衡恪（师会，江西义宁人，光绪二十八年12月赴日）是俞明震的近亲。

<sup>42</sup> 章炳麟还作了《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两首诗（五律阳韵，五律先韵，8月10日），鲁迅当时非常喜欢朗诵这四首诗。特别是写给邹、沈的两首诗直到后来他还记得，并写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自题小像》（七绝元韵）有可能是和章之诗。

<sup>43</sup> 浙江的革命派在《浙江潮》第8期（10月10日发行）及第9期上刊登了飞生（蒋方震）写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一文，文章明确的批判梁启超的新民说与立宪说。光绪二十七、八年是梁启超言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因为他对排满革命与共和制表示支持，所以革命派中也有支持他、与他接近者，但光绪二十九年，梁启超去美国旅行，对共和政体的真实情况感到失望，又回到了支持君主立宪论的立场，在“《苏报》案”中，吴稚晖背叛了章炳麟向当局告密，受到该事件的强烈冲击，梁启超决心不再支持排满革命，并将这个决心告诉了蒋智由（后文提到）（8月19日书简）。可以说“《苏报》案”是导致梁启超与革命派、革命派与梁启超决裂的决定性事件。

<sup>44</sup> 据周作人说，鲁迅当时经常吟诵这首五言律诗，诗中有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的故家》）

<sup>45</sup> 据沈颉民《记光复会二三事》。但前文提到的《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名单》中并未记载二人姓名。

<sup>46</sup> 据沈颉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1961年9月23日《文汇报》）。

<sup>47</sup> 因没余钱，在7年多的留学生涯中，如果没有重大事情，鲁迅从不回国。他的两次回国，第二次是与朱安结婚的时候，那时家中借口其母生病（实际上是说谎）半强制地将鲁迅召回国。问题是1903年的第一次回国，很难认为他只是专为与父母兄弟见面的。笔者认为鲁迅这次回国是为了亲眼确认“《苏报》案”的实际情况及影响。（通过“《苏报》案”加深了他与在日浙江革命派的交往，此次回国或许是在在日革命派的认可知下的行动，近一步说可能是带着调查、联络任务的行动）。

<sup>48</sup> 鲁迅认为缺乏“诚”与“爱”的典型就是在日的变法维新派的学生们，他还写下宝塔诗用来讽刺成城学校的变法派，他们嘴里喊着自由平等实际上却追名逐利（鲁迅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围绕成城学校入学事宜而发生的“吴、孙事件”中的革命派吴稚晖的空洞的英雄主义也抱有反感）。附带一说，鲁迅印在弘道馆牛入分场入门时的《誓文》上的印章的文字是“存诚去伪”。

<sup>49</sup> 如不严格看跋文中“二十一岁时作”这句话，就没有必要将写作时间的下限设定为生日的前一天，那么这首诗便可能在生日之后作。这首诗有可能是鲁迅加入光复会或出席光复会准备会时表达决心的誓诗。

<sup>50</sup> 如山田说⑤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另加拿大的鲍耀明认为：不能只凭“后补以诗”中的“后”来判断为是“在照片背后”，如为此意，则必须说成“后面”、“背面”、“背后”等，因而句中的“后”是中文文言文体，“之后”的意思，这首诗有可能是“之后”写在“照片背后”的，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将“后”解释为“以后”也是正确的，不能将它解释为“后面”。

<sup>51</sup> 藤堂明保认为，“后”很自然的可以解释为“照片后面”、“照片背后”，将其解释为“之后”，是不合理的。

<sup>52</sup> 根据许寿裳的回忆录（丙、庚）做出这样的推测。

<sup>53</sup> 见《浙江潮》第5期。

---

<sup>54</sup> 参考了刊登在《江苏》第3期（1903年6月25日发行）上的《卫生学概论》、《湖北学生界》第2期（同年2月27日发行）上的《医学》、第5期（同年5月27日发行）上的《国民卫生学》等。

<sup>55</sup> 根据沈颀民著《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的记载，在金泽医专的王建善（立才，江苏上海人，前一年10月19日以旁听生身份由同文书院转学到该校医学科），曾经告诉过鲁迅仙台医专地处偏远，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同时，一个叫施霖（雨若，浙江仁和人）的留学生进入仙台二高学习。他与许寿裳一样获得了浙江官费在光绪二十八年8月入学弘文学院普通科（浙江班，未毕业），他很有可能毕业于浙江大学堂（因而他也有可能是浙学会会员）。之后施霖因成绩不佳从二高退学，1907年转学到大阪工业高校应用化学科。另外，比许寿裳晚一个月从浙江大学堂毕业，取得官费入学资格进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浙江班）学习的励家福（绥之，浙江钱塘人，他也有可能是浙学会会员）接受鲁迅的劝说，选择了学医（励《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1961年9月，《鲁迅回忆录》二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有和许寿裳一样在光绪二十八年8月取得浙江官费入学弘文学院普通科（浙江班）的韩清泉（叔陶，浙江慈溪人，他也毕业于浙江大学堂，有可能是浙学会会员）于该学院毕业后，光绪二十九年8月进入金泽医专医科学习，光绪三十年7月，进入金泽医专研究科（附带说明一下，韩清泉与王建善是最早进入金泽医专学习的中国人）。

<sup>56</sup> 刊登于《女子世界》第4、5期合订本，署名索子。是原抱一庵编译的《泰西奇文》（1903年，新知馆）中的路易斯托蕾（美）著《造人术》的重译。

<sup>57</sup> 鲁迅写给朋友蒋林（抑扈，浙江钱塘人，光绪二十八年9月赴日，预备入校，他或许也是浙学会会员）的信（1904年10月8日）中说，朋友任允（克任，浙江仁和人，光绪二十八年3月赴日，物理学校入学）将《释人》和《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中译本《黑奴吁天录》一起送给了他。根据《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的注释，《释人》是“清代孙星衍撰，是考释人及人体各部位古汉语称谓的论文。见于孙著《问字堂集》卷二”。

<sup>58</sup> 有关鲁迅弃医从文之经过，将在其他文章中论述。

（信州大学 全学教育机构 教授）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教授）

（南开大学 滨海学院 专任讲师）

（信州大学 全学教育机构 非常勤讲师）

2011年1月20日受理 2011年2月8日採録決定